

第三节 曹七巧与吉拉蒂的知性比较

在张爱玲和西巫拉帕的《金锁记》和《画中情思》中我们看到，曹七巧出身低微而吉拉蒂出身高贵；曹七巧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吉拉蒂却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曹七巧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的熏染，而吉拉蒂除了接受泰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外，还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显然，曹七巧和吉拉蒂身上的不同气质，对人间事务的不同认知、看法和人生观等，是她们各自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多种文化因素在她身上的一种反映。她们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文化教育背景是影响她们具有不同知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什么是知性？“知性”，一词来源与德文 **Verstand**，被译为“理智”或“悟性”。知性一词，原本是德国古典哲学常用的术语。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知性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在中国也有把这种认知能力叫做悟性。根据学术界的一些看法，一般认为知性是指内在的文化涵养自然发出的外在气质，是一种能反映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和流露。“知性”是对女性身上的文化内涵和气质的一种描述。而“知性美”常用来描述正面的女性形象。知性可以认为是指与感性相对的所谓理性。在知性美的女性身上，具有懂礼、理性、涵养、包容、文雅和聪颖的气质。在她们身上往往散发着知性的柔和魅力，丰富的情感，女人特有的韵味和感知。

曹七巧和吉拉蒂的知性，主要是通过她们对婚姻爱情的认知和人生观，在待人接物中而表现出来。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泰两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身世地位的女性，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气质和文化涵养。在张爱玲和西巫拉帕的笔下，这两位具有不同知性的女性在自己生活的环境里，表现出各自特有的知性美，文化内涵和思想意识。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曹七巧并不是一个被丑化的“下等”女性的形象，而是在特定生活中具有特定知性的特定女性。曹七巧的知性可从她的爱情观与婚姻观中，以及对钱财的态度上表现出来。《金锁记》中曹七巧从情“锁”婚到金“锁”情，是她所生活的环境，封建思想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无奈、对她的影响而造成的。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熏染，曹七巧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和受过什么教育，但她在欺压、等级、欺诈、算计、贪欲和勾心斗角的社会中生活，在开麻油店这个小本生意人家长大，以及婚后被嫁到大户姜家，这些生活经历和社会经验使她不断了解了社会，接触了各种人物，积累了处世之道，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知性。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读者看到了曹七巧所具有的特殊知性和属于她的知性美。

曹七巧在爱情婚姻上有着她的执著和想法，那就是她能为她的爱情而牺牲自己的婚姻。尽管这种牺牲最后又反过来使她在金钱和爱情的天平上倒向了金钱而放弃了爱情。在小说中，虽然曹七巧在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下被嫁到有钱的大户

人家当太太，似乎是一种荣华富贵和美满幸福的婚姻。但实际上她所嫁的人不是健康的男人，而且是不能下床自由走动，要长期躺在床上被人伺候和照看的患有病疾的人。有钱人家的小姐一般都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但当时花一样年华的曹七巧既不为钱也不为财，就是“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为了她的爱情而同意了跟一个残废的人结婚的，尽管结婚的人不是她所爱的人，还常常遭到人家背地里的闲言碎语和歧视，但她当时也心甘情愿。

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曹七巧对爱情追求的执著和为爱情所做出的牺牲。为了见到她所爱的人，她可以忍受跟另一个她所不爱，甚至是病残的人结婚。这不是一般的女性所能做到的。曹七巧对爱情的认知和理念，反映了曹七巧当时的爱情婚姻观。从一个女人对自己所爱的人所做出的这种牺牲，以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华为代价这点来说，尽管曹七巧后来所表现出对爱情和自己儿女婚姻上的变态心理，对获取钱财的欲望和在保护钱财上的神经质，但这些并不能掩盖曹七巧在为爱情而牺牲了自己的美好婚姻，所表现出来的知性美。

在现实生活中，能把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华赔上，而只为了能见到自己心上人的女性又有多少？更不要说她所嫁给的男人是一个“残废”，与他既不能过正常的婚姻生活，又要照顾他病残的肉体。用曹七巧对她所爱恋的人季泽的话来说就是：“你没有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她说完就发自肺腑地呜咽起来，而不能自制。可见曹七巧在身心上和心理上，这些年来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和心酸！

如果把曹七巧的人生之路大体上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是曹七巧嫁到姜家成为姜家二少爷的太太的日子，那么后一部分就是曹七巧守寡分家后的生活。在前一部分，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表现出了一个女性为了与真爱相见而接受无爱的婚姻所体现的一种知性美。后一个部分反映的是曹七巧在婚姻结束后，要用金钱来补偿失去的爱情和了断的婚姻的人生理念和知性。在小说中，张爱玲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原先能忍受屈辱和冷眼，为了爱情而做出牺牲的心理正态的年青女性，后来逐渐变成了一个心理变态，视钱如命，为保住自己的钱财而六亲不认，慢慢走向凋谢的老妇人。

曹七巧把爱情和年华都赔上了，换取的是以女性的青春和爱情婚姻为代价的一笔金钱和财产。她的不幸的婚姻有相当大的原因是来自于她原先对爱情的执著。她后来对紧抓住金钱不放，是因为他的爱情毁灭，青春年华的流逝。在她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金钱才能多少弥补她失去的东西。曹七巧对人生的理念和认知，在守寡和分家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对爱情的追求变成了对爱钱的欲望**。然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不论用多少钱财，也永远换不回一个女人美好的青春年华和失去的真爱！

从曹七巧的身上，表现出了一个女性在不同阶段的知性与气质。如果说在曹七巧一生的前半部，有一种对追求爱情的知性美，那么在她的后半部，主要反映

出的是她的变态心理、对金钱的欲望，表现出了一种管家婆特有的唠唠叨叨、尖酸刻薄的气质，以及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意识。然而，曹七巧的这种金钱欲望又是因为其爱情的破灭和扭曲的婚姻，给她在心理上和现实生活上的沉重打击、深深的伤害、长期的折磨、封建歧视而产生的。

曹七巧在守寡分家后，她对生活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在她看来，爱情死亡了，婚姻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金钱才是最可贵，最可靠，最实用，最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她认为有了钱就有了她在后半生的一切。她可以用这笔以她的青春年华和可悲的婚姻为代价换来的钱财打理她的家务，操办儿女的婚姻，为儿女的今后的生活做储备。虽然在她的心里偶尔还能流露出对过去美好爱情的一丝回味和体验，但更多的是在掌管家事，处理儿女的婚姻，窥探儿子的夫妻生活和抽大烟中，一点点地消磨自己的生命。小说中写道：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有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青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柔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1]

曹七巧的知性从开始的知“情”，到后来的知“金”，从开始的恋情到后来的恋金，是随着她的人生变化而变化。在回顾往事，梳理自己过去的人生时，她似乎悟感到了什么。从她流下的眼泪中，我们不是也看到了她对生活的知性和对人生的留念与感伤吗？曹七巧身上的知性和气质，是中国当时封建社会礼教、儒家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在其身上的反映。这种知性和气质与在同一时代生活，却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身世与家教的吉拉蒂身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内涵。当我们把中泰现代小说家笔下的悲剧女性的不同知性进行比较分析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她们身上所反映出的不同的知性美，不同的文化气质和思想内涵。

在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中，吉拉蒂在如何对待自己的爱情生活上所表现出的知性，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完全不同的。吉拉蒂的知性反映出她的认知和品性。吉拉蒂的生活面远不像曹七巧那样广，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接触不同类型的男性。另外，吉拉蒂在面对爱情时，也不像曹七巧那样可以为自己的真爱而做出大胆的举动和追求。这种反映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不同知性，也是与吉拉蒂所生活的环境和文化教育分不开

^[1]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572页

的。吉拉蒂从小就生活在优厚的王室家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不用为自己的物质生活担忧。她基本上在王室贵族的圈里生活。而且吉拉蒂受到的教育也是泰国贵族的正统良好的传统教育。她在父亲为她打造好的“金丝鸟笼里”去感受她所生活的人和事。因此她不可能有像曹七巧那样的知性。用吉拉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的妹妹结婚走了以后，我也梦想过得到爱情和欢乐。然而，又过了两年，我的大妹妹有和她所爱的男人结了婚，走了。只是这时，我才开始感到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幸的人。

……和妹妹相比，可以说我是过着幽禁的生活的，完全被排斥在现实生活之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如果我生来丑陋，也许就不会感到悲哀和不幸。然而上帝或别的什么神灵，既然赐给我以美色，为什么又不给我以出路呢？为什么要让我在寂寞无聊中把自己的美色虚掷呢？^[1]

在吉拉蒂的意识中，她所认知的爱情似乎是在生活中等来的，是上天自然而然赐给她的，或是父母为她安排好的，而不是在多方面社会生活的接触中主动争取来的。特别是当她看到她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后，她却还在空守阁楼，更是在心理上产生了不平衡。当吉拉蒂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她在无奈之下也和曹七巧一样在无爱中被迫结婚了。然而不同的是曹七巧已有了爱，为了能见到所爱的人而与无爱的残病人结婚的。而吉拉蒂却是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只是为了满足只有婚姻才能带给她的一些需要而与无爱的 50 多岁的人结婚的。直到婚后与她的丈夫来到日本度假时见到了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泰国留学生诺帕朋后，爱情的火花才在吉拉蒂的心里逐渐燃烧起来。

虽然吉拉蒂对诺帕朋爱情越来越强烈，但由于吉拉蒂从小到大所受到的传统教育，在她已是妇之夫后，她不能不遵守妇道和传统礼教。她把对诺帕朋的爱牢牢地锁在心里，只是保持友谊和亲密朋友的关系，对诺帕朋总是像姐姐对弟弟那样，绝不做出超友谊的行为和举止。从吉拉蒂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受过良好教养的妇之夫的知性美。在她一生所渴望的爱情来临时，仍然可以做到自我克制，始终保持着理性和应有的分寸。她的优美和端庄的气质让爱上她的诺帕朋不能不敬而远之，而又难以割舍。尽管吉拉蒂不断地压抑自己心中的爱情，但爱情的欲火越燃烧，心里的痛苦就越大。

吉拉蒂在对待爱情和金钱上所表现出的知性与曹七巧是不同的。曹七巧从追求爱情到追求金钱，是因为曹七巧在失去爱情的欲望和守寡后她对人生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她要用金钱来补偿她那扭曲的爱情和不幸的婚姻给她带来的痛苦

^[1] 西巫拉帕：《画中情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48-49页

和失去东西。她从小媳妇熬成了婆，从对爱情的向往变成了对钱财的索取，从一个身份低微的人成了一个有些钱财的人，从被人呵斥和看不起的人变成了一家之主。这种人生的变化必然会改变和影响曹七巧的知性和人生理念。

而在吉拉蒂的思想意识中在婚前她享受的是王族富贵的生活，幻想的是美满的爱情会从天而降。她把世界和人生都想得十分美好和纯洁。在她身上反映了一种对人生充满天真和浪漫的知性。这种知性在出身低微，从小就要为生活而辛劳的曹七巧身上是不可能产生的。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吉拉蒂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爱情的缺失和婚姻的压力又使吉拉蒂在对人生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在他父亲的介绍下，在大龄的压力下她不得不同意把自己嫁给了 50 多岁的鳏夫昭坤。这时在她的知性中所反映的就是做好一个贤妻，尽一个妻子的义务，享受一种无爱的婚姻生活。在她心里似乎已经了断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她的谈话举止都显示出一个贵妇人的气质和知性。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当她随丈夫来到日本度假时，遇到了年青的泰国留学生诺帕朋。爱情的欲火在她心里被点燃，她从无爱的婚姻中感受到了有爱的婚外情。但由于吉拉蒂所受到的传统教育和在伦理道德的约束下，她只能把这种姐弟恋式的婚外情深深地埋在心里。在吉拉蒂的身上表现的是一种对婚姻和爱情的一种非常理智的知性和尽量掌握分寸的言行举止。

在爱情与金钱的关系上吉拉蒂与曹七巧的认知与知性也是完全不同的。曹七巧从原来的追求爱情到后来的追求金钱，是因为她的生活环境，人生的改变，爱情的破灭，以及对人世间的冷暖切身感悟所决定的。而吉拉蒂不同，她在年青时向往爱情，在婚后遇到爱情，在守寡后又压抑爱情。尽管吉拉蒂和曹七巧一样，在自己的丈夫去世后都得到了一笔不菲的“遗产”，但对两者的人生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对曹七巧来说，她所分到的家产是以牺牲一个女人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为代价而换来的，她要这笔在家产，因为那是她今后生活和地位的保障，是一种人生悲剧性的交易。

对吉拉蒂来说，她所得到的遗产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牺牲了她的爱情而与昭坤结婚才得到的。由于得到了这笔遗产，吉拉蒂“一下子变成了有钱的人”。但与此同时，吉拉蒂“却不得不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可吉拉蒂“并不期望得到他的遗产”。因为在吉拉蒂的意识中这笔遗产并不是像曹七巧那样是用婚姻交换而来的，更不是为了钱财而结婚的。正如吉拉蒂对自己所爱的人诺帕朋所说的：

金钱当然是有其威力的，但它不能主宰一切。也许我所希望和期待的东西，不是金钱的威力所能左右的，这正是我的最大不幸。^[1]

^[1] 西巫拉帕：《画中情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89页

在婚姻与金钱的关系上，曹七巧把婚姻当成了一种交换钱财的手段。而吉拉蒂则认为金钱是买不来真爱的。金钱并不是万能的，也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在她的人生中，她不需要也不会用牺牲爱情和婚姻为代价来换取钱财。因为造成吉拉蒂爱情的缺失，无爱的婚姻，以及后来有爱的痛苦，并不是因为金钱和财富。在爱情和婚姻的不幸方面，如果说对金钱和财富上的获取，在曹七巧看来是一种精神上的补偿和人生交换的话，那么对吉拉蒂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在对财富的认知上，曹七巧与吉拉蒂表现出了不同的知性。

曹七巧与吉拉蒂是生活在不同家庭环境和物质条件下的女性。这种不同的环境对她们的思想意识上，精神生活，以及爱情和婚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她们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在她们身上反映出了不同的知性和气质。而她们不同的知性和气质又是通过她们对待爱情、婚姻、金钱和人生的态度而反映出来的。

第三章 《金锁记》与《画中情思》女性意识比较

第一节 曹七巧与吉拉蒂的爱情意识

曹七巧的爱情意识是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要内容。曹七巧的悲剧形象中所表现出来的从情“锁”婚到金“锁”情的过程，就是缠绕着爱情来展开的。在这里面除了曹七巧自己的爱情纠葛外，还包括了曹七巧对她子女爱情生活的态度和干预。

张爱玲的这部小说是从三十年前的月光说起，也是从谈到三十年前的月光结束。在小说中曹七巧的主要人生经历刚好也是三十年。这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也可以说是从曹七巧的爱情开始到爱情毁灭，最后到对其子女爱情生活干预的三十年，是从“情”起，到“情”死的三十年。她的爱情意识在恋情转变成恋金的过程中，如风中残烛渐渐熄灭。

与张爱玲的《金锁记》一样，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的主线也是围绕着爱情而展开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吉拉蒂的爱情生活是从三十五岁婚后才开始的。在这以前，吉拉蒂的爱情意识只是在她的向往和渴望中，只有在认识了诺帕朋后，她的爱情意识才在她的生活中真正展现出来并逐渐加强。

曹七巧的爱情意识是从强烈到泯灭，越是接近人生的尽头，越是表现出一种百无聊赖，不堪回首，心灰意懒的境地。而吉拉蒂的爱情意识是从点燃到燃烧，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越是使心中让渴望而不可及的爱情烈火熊熊燃烧，直到离

开人间都没有熄灭。

由于曹七巧的生活环境不像吉拉蒂那样，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而是可以和社会上不同人物接触，有比较广的社交机会，这也使曹七巧能认识不少男性。姜家三少爷季泽就是曹七巧在嫁到姜家前认识的，是她暗恋的对象。小说中虽然没有具体描写曹七巧在嫁到姜家前与姜家三少爷是怎样相识和暗恋的，但在曹七巧嫁到姜家后，从小说对曹七巧与姜季泽的接触，话语和叙述中，读者就可以知道曹七巧之所以来到姜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曹七巧自己所说的：“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从曹七巧的心声中我们不难看到曹七巧的爱情意识，特别是一种来自女性的主动的爱情意识是如此的强烈。强烈到可以牺牲自己的婚姻，用与他人的无爱婚姻来换取与有情人相爱和见面的机会。

但是当曹七巧来到姜家后，她与季泽的爱情并没有正常地发展，而是在一种暧昧、难以明言，两人心照不宣、打情骂俏，话里有话的隐讳中纠缠不清，甚至发展到分家后，曹七巧为了保住她用她的青春年华换来的钱财而对姜季泽大打出手，认为季泽来见她完全是为了骗她的钱，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从张爱玲这部小说的整个故事来看，曹七巧的爱情意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表现出曹七巧婚姻前对爱情的渴望，强烈的追求和自我牺牲。

第二个阶段：表现出曹七巧婚后爱情发展的曲折，晦涩和无奈。

第三个阶段：表现出曹七巧在分家后爱情意识转化为金钱意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曹七巧头脑里爱情意识的发展变化是随着其本身的生活发展轨迹而表现出来的。在曹七巧爱情意识的第一个阶段里，小说中叙述了曹七巧为什么要嫁到姜家的动机和想法，这就是为了要和姜家三少爷季泽相爱。在这一阶段，曹七巧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即使不能与相爱的人结婚，就是能不时看到所爱的人也心甘情愿。但当她嫁给整天躺在床上，没有什么生命活力的二少爷后，曹七巧的爱情意识不断遭到现实生活的打击和压力，她的爱情生活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和浪漫。

在第二阶段，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一天，曹七巧一直暗恋的人三少爷季泽微笑地对她说：

二嫂，自古好心没有好报，谁都不承你的情！”曹七巧于是说：“不承情也罢！我也惯了。我进了你姜家的门，别的不说，单只守着你二哥这些年，衣不解带的服侍他，也就是有功无过的人，谁见我的情来？谁有半点好处到我头上？”^[1]

^[1]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551页

从曹七巧的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曹七巧在姜家的处境和地位，但另一方面也似乎可以感到曹七巧是“话中有话”。在曹七巧口中这个“情”中也包含着曹七巧在抱怨姜季泽不领她的“情”，让她对所爱的人的“情”被冷落而借机在发泄她的委屈和郁闷。

在小说中，曹七巧对季泽的爱情与季泽对曹七巧的“爱情”是不对称的。前者对季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爱，是身份低微的女性对有身份的男性的爱恋。在开始时曹七巧并不是为了贪图什么钱财才爱上季泽的。而后者对曹七巧却没有什麼真爱。在季泽身上反映出的是一种男性沾花惹草，对女性的兴趣和需要而已。这位姜家三少爷对曹七巧如果说有什么“爱情意识”的话，那不过是对女人的“男性意识”。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当曹七巧开始低声对季泽说：“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后，又笑了一声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这时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尽管季泽常在外面找女人，但他认为对曹七巧可是不行。因为

玩尽管玩，他早就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的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做，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1]

可见在曹与姜的关系上，曹七巧对姜季泽的爱情主要是单方面的。姜季泽对曹七巧有点意思，但不过是嘴上调情而已，对曹七巧并没有什麼真正的爱意。曹七巧可以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婚姻，而姜季泽却不能为了自己的一时“兴致”，给在情感和身心上荒芜的曹七巧一些安慰和满足，做出一些有可能不利于自己的“牺牲”，在众目睽睽之下惹上一身麻烦。

在第三阶段里，曹与姜之间若近若离的暧昧关系似乎有了一个明确结果，两人的爱情终于有了一个了结。《金锁记》中有一段描写，特别能反映曹七巧对姜季泽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当曹七巧的丈夫去世，她得到了一部分家产后，有一天季泽突然来找曹七巧，这让曹七巧很是意外。特别是当季泽告诉七巧，以前他为什么老是离家到外面去，就是为了躲着她。他怕自己因为爱上七巧而不能自拔。在中国封建礼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下，又是生长在大户人家的季泽，就算是他真的喜欢上曹七巧，但

^[1]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553页

在曹七巧已经嫁给他的二哥，成了他的二嫂后，他对曹七巧那咄咄逼人的爱意，只能退避三舍，爱而远之。在当时的大家人家里若出现了嫂子与小叔子之间的暧昧关系和恋情，都是大逆不道和有悖于伦理道德的。人言可畏，对姜季泽来说是万万不能触动这个底线和定时炸弹的。何况季泽是否真的喜欢曹七巧，还是怕惹来一身麻烦而真的在躲避曹七巧也很难说。

然而，季泽对七巧的一通表白，却着实让七巧感到“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在七巧看来“这些年来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这是曹七巧嫁到姜家后，最让她感到欣慰和暂时可以释怀的美好时刻。但好景不长，曹七巧感到季泽来找她并不是为了找回失去的爱情，而是要算计她的钱。这时，曹七巧一时气不打一处来，把姜季泽给打了出去。但在曹七巧的心里深处，她还是对季泽有着挥不去的爱意的。

小说中最能表现曹七巧的对季泽的爱情意识的情节，恐怕就是在曹七巧把季泽赶出去后，又要再看看由于她的这一不理智的举动而正匆匆往外走的季泽的最后身影，所反映出来的复杂心情和那段泪流满面的描写了。因为她这一打，不仅打走了季泽，也打断了这多少年来她与季泽断断续续的恋情。为了维持这段恋情曹七巧忍辱负重，不惜嫁给一个没有活力，整天躺在床上的“肉体”的姜家二少爷。如果说她与季泽的爱情是因为她的主动才使她能与季泽有相见传情的机会，那么她与季泽的最后一段情丝，也是由于她的“主动”而被她亲手掐断了。她不能不痛苦，不能不伤心。那以泪洗面的泪水似乎在诉说着曹七巧爱情悲剧的点点滴滴和内心深处的辛酸苦辣。小说中描写到：

曹七巧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1]

从这段描写中，读者也可以看到曹七巧对季泽是爱之深与恨之切。这也让曹七巧似乎悟到了爱情的哲理，这就是季泽“不是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如果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话，那么为了爱，女人就是不喜欢男人的坏，也要包容男人的坏。然而，曹七巧如果能容忍季泽的“坏”，是否真的就能保持住她对季泽的“爱”吗？曹七巧之所以会在分家后，当季泽找她的时候一开始还能表现出一种心中的甜蜜，是因为在她心中还保留着对他的一丝恋情。可一旦她感觉到季泽可能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套她的钱来找

^[1]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560页

她时，她的警觉性马上让她把她对季泽的“爱情意识”转变成了“金钱意识”。

为了保住她用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萎缩的爱情和畸形的婚姻的代价所换来的钱财，她不能让爱情冲昏了头脑。在她的思想中，金钱的意识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既然爱情得不到，婚姻已结束，那么只有到手的金钱和家产才是最可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和抓得着的。在曹七巧的思想中，这时与其再迁就“不实惠的”爱情，不如牢牢把握住已到手的金钱。这笔家产能让她过得上不再被人歧视、有钱花、有大烟抽的生活。曹七巧这种“爱情意识”向“金钱意识”的转变，也是曹七巧现实生活的转变。

与曹七巧不同，在《画中情思》中的吉拉蒂，她的爱情意识的发展变化可以分为从无到有和从弱到强这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吉拉蒂的爱情意识可以说是从她那两个妹妹相继结婚，她自己的年纪一天天大起来后，才逐渐进入了她的头脑中的，使她憧憬和向往自己也能和其他女人一样，也能够享受爱情的甜蜜和浪漫。但由于家庭环境，王室的背景，狭窄的生活圈子，传统思想道德教育和个人性格等多种因素，吉拉蒂不可能像一般女性那样在生活中接触很多男性，自由和宽泛地与他们进行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另外，爱情意识不是孤立产生的，它既受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经济状况，思想意识的影响，也受到一个人的气质、谈吐、身材和容貌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在第二个阶段，当吉拉蒂在日本与其丈夫度假时遇到了英俊潇洒，知书达理，热情洋溢的留日泰国学生诺帕朋后，在吉拉蒂的心中即将泯灭的爱情意识被诺帕朋热情和爱情给点燃了。

对吉拉蒂来说，她的爱情意识的产生与曹七巧是不同的。如果说曹七巧对姜家三少爷季泽的爱情意识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对方的外貌和家庭等因素，那么吉拉蒂对诺帕朋的爱情意识的产生，则主要是对方的谈吐、言行和才貌等因素。从西巫拉帕在《画中情思》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诺帕朋第一次见到吉拉蒂的时候，吸引他的是吉拉蒂的美貌和气质。而吸引吉拉蒂的是诺帕朋的谈吐和热情。吉拉蒂在逐步推心置腹的交谈中，慢慢产生了对诺帕朋的爱情。对吉拉蒂来说，虽然这是个迟来的爱情，但这个爱情火苗却开始在她心中逐渐燃烧起来。

在吉拉蒂结婚前，她已经有了爱情意识，但她并没有真正得到爱情。在吉拉蒂结婚后，没想到在日本，她的爱情意识又再一次被唤醒，让她真正得到了爱情。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曹七巧对季泽的爱情是在她婚前就产生了，她为追求这份爱才与不爱的人结婚的，并在婚后试图继续她的爱。而吉拉蒂在婚前并没有她所爱的对象。由于年龄的压力，以及她也想要体验一个女人在婚姻中身心上的感受，吉拉蒂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与不爱的人结婚的。然而，吉拉蒂没有想到婚后还能在异国他乡竟然遇到了她所爱的人，让她在无爱的婚姻以外，有了爱情的幸福和

爱情的痛苦。在吉拉蒂的心里这种爱越是强烈，她越是把这种爱深深地埋在心中。

由于要遵守妇道和传统道德，以及年龄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障碍等因素，这种姐弟恋的爱情状况，始终被吉拉蒂小心谨慎地控制在友情的程度上。尽管吉拉蒂心里明白这是在自欺欺人，但由于传统文化，贵族家庭的环境和道德规范的束缚，吉拉蒂的爱情意识不可能像今天的人那样具有开放性，在她的思想意识中她不可能冲破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更不可能像曹七巧那样，尽管已经与不爱的人结婚了，但还会主动地与她所爱的人打情骂俏，主动表白自己的爱意，敢恨敢爱，有一种泼辣的性格。

在吉拉蒂与诺帕朋的爱情中，吉拉蒂实际上是处在被动的地位。如果不是诺帕朋的主动表白，大胆向吉拉蒂表示爱情，吉拉蒂对诺帕朋的爱情意识可能也只是隐藏在她的心里罢了。姐弟恋中“弟”往往是处于主动的地位，而“姐”处在被动的地位。在西巫拉帕的这部小说中也是那样。在诺帕朋的步步进攻下，吉拉蒂却是步步为营，几乎从不主动“出击”，甚至一再把诺帕朋对她燃起的爱火给控制在友情的范围内。吉拉蒂一方面为自己能有爱的人而心动不已，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的处境、身份和年龄而不能让她与诺帕朋的爱情开花结果而在痛苦中煎熬。尽管吉拉蒂实际上是多么想与诺帕朋成为真正的情人、恋人和爱人。但吉拉蒂在已婚的状况下，在社会、家庭和伦理道德上，她作为有夫之妻，她必须恪守妇道的底线，这样才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才符合吉拉蒂当时的身份。

然而在西巫拉帕的笔下，吉拉蒂的爱情意识在她的头脑里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吉拉蒂与诺帕朋之间的爱在形式上是一种姐弟恋，但实际上表现出的是男女双方对爱情的渴望和情感的交流。只不过出于身份和年龄的因素，吉拉蒂不能像一般青年男女那样去享受爱情的自由和幸福。在吉拉蒂对诺帕朋产生爱情前后，她的爱情意识发生了三种变化：

一、吉拉蒂结婚后和认识诺帕朋前的爱情意识

当诺帕朋认为吉拉蒂的家庭生活和夫妻之间是幸福的时候，吉拉蒂表明了她的爱情意识。她说爱情不一定是幸福的基础，“爱情可以给生活带来痛苦或种种不幸”。但她也认为“真正感受到爱情的温暖的人，心里应该永远是甜滋滋的，永远充满着柔情蜜意”，但她自己却并没有这种切身体会。对已婚的吉拉蒂来说，她“不相信老夫老妻之间会有爱情”。正是因为这样，她并不企求从她的上了年纪的丈夫那里“得到暖人肺腑的爱情”。

二、吉拉蒂与诺帕朋相识后的爱情意识

在吉拉蒂认识诺帕朋后，爱情悄然来到了她的身边。她开始有了爱情的“切

身体会”。正如诺帕朋所说的他与吉拉蒂“已经亲密无间、心心相印”了。这是的吉拉蒂真的是像她所说的那样“是甜滋滋的”，“充满着柔情蜜意”。当诺帕朋终于忍不住紧紧地搂住吉拉蒂并深情地吻着她时，因碍于有夫之妇的身份，吉拉蒂始终把这种爱规范在那种纯真的思想感情交流的范围，而不让诺帕朋越雷池一步。她像大姐姐教导小弟弟那样对诺帕朋说：

你就得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并为未来的生活制定远大的蓝天。而我的义务只能是忠于昭坤，只要他还需要我，只要他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得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服侍他，尽妻子的义务。^[1]

从表面上看，吉拉蒂尽量把诺帕朋的爱情化成一般的友情，来抵御诺帕朋的爱情攻势。但实际上，吉拉蒂在心里是多么渴望和享受这种爱情。这种迟来的爱情对她这样一个大龄女性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和不易。可另一方面，由于她的身份和道德意识又不允许她大胆和自由地释放她的感情，她要恪守妇道。在这一阶段，吉拉蒂的爱情意识反映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三、吉拉蒂离开诺帕朋和丧夫后的爱情意识

由于吉拉蒂一直把自己对诺帕朋的爱埋在心上，让诺帕朋对吉拉蒂的爱火在时间的消磨中渐渐熄灭。当诺帕朋从日本回曼谷后，虽然吉拉蒂在内心上非常想与诺帕朋相见，但由于诺帕朋相隔两个月之后才来见她，这让吉拉蒂又失望又痛心。然而这种伤心的情绪却被诺帕朋察觉了出来。特别是当吉拉蒂听到诺帕朋说他不久就要结婚了的消息时，“她露出了大吃一惊的表情”。

在吉拉蒂的爱情意识中也反映出爱情是自私的特性。当吉拉蒂所爱的人要离她而去与别的女人结婚时，她表现出了一种惆怅、痛苦和难言之隐的心态。在诺帕朋对吉拉蒂爱情之火旺盛时，他向吉拉蒂主动示爱，可是吉拉蒂在表面上拒绝了他的爱；但当诺帕朋真的要离她而去时，吉拉蒂又感到痛苦和失望。在吉拉蒂的身上进一步反映出她爱情意识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然而，尽管在吉拉蒂的爱情意识中存在着矛盾和复杂的心理因素，但她对爱情的渴望却并没有因为不能得到爱而熄灭和绝望，反而爱情之火在她的心里越烧越旺。她把这种爱深深地埋在她心里。她并没有像曹七巧那样，表现出一种狂躁和冲动，把爱变成恨，使爱情意识转向为金钱意识。

在吉拉蒂的意识中，爱情是男女婚姻的“先决条件”。可是她自己却在“男

^[1] 西巫拉帕：《画中情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57页

“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思想下，在没有爱情的条件下结婚了。这种无奈和痛苦的经历使她在有了爱情后，对爱情有一种特别的珍惜和留恋。她不愿这种爱受到任何伤害，她要让这份爱永远留在她的心里。吉拉蒂在传统意识下表现出爱情意识，在无爱的婚姻中体验着有爱的幸福，在有爱的幸福中又竭力掩饰被爱的心动，在终于有了自己爱的人的感情世界中，忍受着只有爱却最终得不到爱的痛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曹七巧与吉拉蒂在爱情意识上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她们的共同点是她们的婚姻都是没有爱情的，但她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她们在爱情上都是既有值得留念的幸福和美好的记忆，又有必须忍受的痛苦和无奈。

如果说曹七巧的爱情意识向金钱意识的转化，是爱情破灭后的选择和补偿，那么对吉拉蒂来说，在爱情意识与传统意识的天平上，爱情意识受制于传统意识，是她无法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真正得到爱情的一个主要原因。

两者的爱情意识都是在表面上风平浪静，不显山露水，但在各自的心里却都是波澜起伏。在《金锁记》中是女方主动，男方被动。在《画中情思》中是男方主动而女方被动。前者是女方的爱情欲望先强后弱，后者却是先弱后强。对曹七巧来说，为爱情她可以牺牲婚姻，但为了金钱，她也可以牺牲爱情。对吉拉蒂来说，没有爱情她可以被迫接受婚姻，但为了维护传统礼教，她也可以在表面上拒绝爱情。

显然，在曹七巧和吉拉蒂的爱情意识中都埋藏着悲剧的因素。在曹七巧和吉拉蒂的生活中，爱情意识的转变也预示着人生的变化：前者是从有爱、为爱到无爱。后者是从无爱、想爱到爱到死。**对曹七巧来说，随着生命的终结爱情也了结了。然而对吉拉蒂来说，即使生命即将熄灭但爱情却不灭。**

第二节 曹七巧与吉拉蒂的婚姻意识

曹七巧和吉拉蒂的婚姻意识是以她们的爱情意识为基础的，是爱情意识在婚姻上的反映。曹七巧和吉拉蒂都是在无爱下结婚的，所不同的是，曹七巧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长期卧床、患有骨病的姜家二少爷，而吉拉蒂嫁给的是一个五十多岁曾丧妻的有钱有身份的男人。前者是为了另一个爱与这个无爱的人结婚的。后者是没有另一个爱而与那个无爱的人结婚的。

对曹七巧的婚姻来说，在当时的封建婚姻制度下，她虽然不能与爱的人结婚，但她可以见到她所爱的人。在曹七巧的婚姻意识中还是以爱情为前提的。就像中国一部电影《非诚勿扰》中所反映的一种男女婚姻状况，即作为一个女人，人在所结婚的那个男人那里，可心却在不能结婚的那个男人那里。这也就是曹七巧开

始时的婚姻意识。

在这种婚姻意识下，曹七巧嫁给了犹如死人的男人。她看到的是“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曹七巧一方面忍受着与没有活力的男人同床的婚姻生活，一方面又苦苦追寻着不能与她结婚的那个人的爱情。这种婚姻意识既包含着对爱情的渴望，又包含着无爱的痛苦。在这种病态的婚姻意识下，由于曹七巧长期得不到正常的婚姻生活，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与自己爱慕的人谈情说爱，更不能与她所爱的人结婚，所以她只能在扭曲的爱情婚姻中煎熬。当她与她所爱的姜家三少爷姜季泽打情骂俏，想在痛苦的婚姻中得到一点真爱的幸福时，姜季泽却怕乱了伦理，遭来闲言碎语，一直对她不冷不热。曹七巧是为了爱他，才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幸福而嫁到姜家的，可他却躲躲闪闪，这让曹七巧在感情上遭到了不小的打击。当曹七巧终于从病态的婚姻中熬出来后，这时她的婚姻意识也发生了变化。

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这些年来，曹七巧与姜季泽如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季泽的身。如今虽然她从噩梦般的婚姻中解脱了出来，可她也人老珠黄，这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年纪已经过去了。特别是曹七巧在用她的青春年华和痛苦婚姻的代价换来了一笔分家后的财产后，爱情和婚姻对她来说已不是重要的了，金钱对她来说才是保证她今后有安稳生活的支柱。这时，让她牺牲金钱来换取爱情婚姻是完全不可能的了。爱情至上的曹七巧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金钱至上的曹七巧了。

尽管如此，在曹七巧的头脑中，婚姻意识并不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已转化成对自己儿子的婚姻生活的窥视。虽然曹七巧从来没有享受过正常人的婚姻生活，也不可能再有实际的婚姻生活了，但这并不代表她在思想意识上没有对真正婚姻生活的渴望和欲望。曹七巧从打听自己儿子的婚姻生活中，从在众人前面戏谈自己儿媳的婚姻生活而让她无地自容中，来满足她当年所得不到的婚姻的乐趣和身心享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婚姻下，曹七巧在爱情和婚姻上的悲剧，让她产生了这种病态的婚姻意识。纯洁的爱情在不自由的封建婚姻制度下，导致了曹七巧没有幸福的婚姻和变态的思想意识。

然而，对吉拉蒂来说，她所生活的环境虽然没有让她像曹七巧那样，在无爱的婚姻中产生变态的婚姻意识，但吉拉蒂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遇到了爱情后，让她产生了病态的婚姻意识，并在婚姻和生活中痛苦地挣扎直到离开人世。不管是吉拉蒂的病态婚姻意识，还是曹七巧的变态婚姻意识，都是她们在爱情与婚姻上遭受挫折的结果和反映。

在吉拉蒂的人生中，她从没有婚姻意识到有了婚姻意识，最后又产生了病态的婚姻意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吉拉蒂从小一直生活在贵族的生活圈子里。狭小的生活范围使她基本上与同性接触。所以，吉拉蒂大都过着天真烂漫的少女生

活。当她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后，她的年龄也一天天增加，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及年龄不饶人的压力下，吉拉蒂不得不接受了没有爱情的婚姻。

尽管如此，吉拉蒂在传统教育下一直认为男女结合应该是男女双方爱情的结果。但吉拉蒂自己的生活却让她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与不爱的人结合了。吉拉蒂这种正统的婚姻意识，在她婚后遇到她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让她产生爱情的英俊男子后，给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了苦果。

吉拉蒂结婚后如果没有碰上让他心动的诺帕朋，可能她的婚姻生活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下去了。吉拉蒂的丈夫昭坤为了让吉拉蒂散散心，出来见见世面，他决定带吉拉蒂到日本过蜜月。由于传统道德的影响和吉拉蒂的婚姻意识，尽管吉拉蒂在日本认识了诺帕朋，而且产生了爱情，爱情之火越烧越旺，但她并没有让日益燃烧的爱情导致她与昭坤的婚姻破裂。反而，她把她与诺帕朋的爱情极力限制在“姐弟情”的范围内。

在诺帕朋直言不讳地向吉拉蒂表白他的爱情时，吉拉蒂却像姐姐教导弟弟一样让诺帕朋保持理智，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吉拉蒂和诺帕朋之间的暧昧关系被仆人察觉后，吉拉蒂在她丈夫面前仍然表现得与诺帕朋之间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吉拉蒂之所以这样做，是她认为既然她已为人妻，就要坚守妇道。在吉拉蒂的思想意识中她要好做一个好妻子，满足丈夫的婚姻生活，为昭坤生儿育女，做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和贤妻良母。尽管吉拉蒂并没有为昭坤养儿育女，这在吉拉蒂心里还感到有些遗憾。然而，在爱情和婚姻之间，她把她与丈夫的婚姻关系看得比她与诺帕朋之间的爱情关系更重要。她不能让她与诺帕朋的爱情破坏了现有的婚姻，虽然在她的婚姻中并没有爱情。

可见，在小说中西巫拉帕所描写的吉拉蒂是一个在婚姻上思想保守，恪守传统伦理道德，不敢为了爱情而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敢爱敢做的一位贵族女性。吉拉蒂的这种婚姻意识也是她的爱情悲剧和人生不幸的一个主要原因。西巫拉帕对吉拉蒂的描写是成功的，也是符合她的身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泰国王室家庭里长大、成长和生活的吉拉蒂，她的婚姻意识就是那个时代其生活环境，家庭教育和传统伦理道德在她身上的反映。她在生活上缺乏主动性，在爱情上是被动的，在婚姻上观念上也传统的。因此在吉拉蒂身上，我们不可能看到她像其他一些能为爱情奋不顾身，敢想敢爱的女性那样，为爱情而牺牲家庭，冲破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走出无爱婚姻的羁绊，勇敢去追求有爱的婚姻和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

其实在维持现有的婚姻状态方面，曹七巧和吉拉蒂一样也不能为了爱情而冲破婚姻的束缚。曹七巧虽然没有像吉拉蒂那样具有王室的身份，良好的教育和富

裕的家庭，也不像吉拉蒂那样生活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但曹七巧同样也不能挣脱建婚姻制度的枷锁，不能摆脱传统封建意识而大胆追求爱情，成为一个反抗旧的婚姻制度的叛逆女性。在小说中，她自己本身也被陷入在封建礼教的泥潭中。她包办自己子女的婚姻，干涉她们的恋爱婚姻自由。让她自己身上发生的悲剧在其子女身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

她与姜家三少爷的恋情，是在不明不暗中进行的，充其量也就是在众人面前说一些打情骂俏的话罢了。就算是曹七巧有与姜家三少爷暗地来往的心，姜家三少爷也没有这个胆。封建大家庭的等级制度，严格的封建传统礼教和包办婚姻，再加上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人言可畏和“三从四德”的儒家思想，在曹七巧的婚姻意识中，她只能在这个封建家庭中逆来顺受，在无爱的婚姻中利用一些两人见面的机会，去追求一点隐性的爱情和心理上的安慰，顶多做出一些语言上的反抗。

从以上对曹七巧和吉拉蒂的婚姻意识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的婚姻都是在没有爱情的基础上被迫的婚姻。所不同的是曹七巧是为了爱情而与不爱的人结婚的，吉拉蒂却是因没有爱而不得不与无爱的人结婚的。曹七巧是为了通过无爱的婚姻而追求自己的爱情。而吉拉蒂是在无爱的婚姻里无意中遇到了自己的爱情。然而，尽管她们的婚姻都没有爱情，也不是她们所追求的，但在结婚后她们都在形式上和思想上或多或少地默认了这种无爱的婚姻。

在分析曹七巧和吉拉蒂的婚姻时，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婚姻意识中的“三态”：

——正态的婚姻意识

——变态的婚姻意识

——病态的婚姻意识

如果说曹七巧的婚姻意识从正态的婚姻意识转变成**变态的**婚姻意识的话，那么吉拉蒂的婚姻意识却是从正态的婚姻意识转变成**病态的**婚姻意识。不管是变态的婚姻意识还是病态的婚姻意识，她们都不能在婚姻后真正享受到爱情的幸福和婚姻的美满，反而带给她们的是无奈的现实、痛苦的等待、被迫的放弃和永远的遗憾。

一方面，曹七巧的婚姻本应该随着无爱婚姻的结束而获得有爱的婚姻，但现实生活反而使她的爱情随着无爱婚姻的结束而结束。当她的婚姻意识和她的爱情意识一起转化为金钱意识后，她对自身婚姻生活的“关注”也转变成对她子女的婚姻的窥视和干预，把她自己在婚姻上的悲剧以另一种形式转移到她子女的身上。

另一方面，吉拉蒂的婚姻也本应该在有了爱情后而去大胆追求有爱的婚姻，可是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她却没有在无爱的婚姻结束后主动去追求有爱的婚

姻。吉拉蒂的爱情没有像曹七巧那样在婚姻结束后而无奈地结束，反而在婚姻结束和不能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合后，她的爱情之火却越烧越旺，随着她的生命的结束而与她的灵魂永远伴随在一起。

第三节 曹七巧与吉拉蒂的悲情意识

对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和西巫拉帕笔下的吉拉蒂来说，不管是生活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是生活在泰国深受佛教思想影响，不管是出身低微还是出身高贵，她们在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中都有着一种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是她们生活上的悲情，家庭上的悲情，爱情上的悲情和婚姻上的悲情在其人生中的一个集中反映。

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和泰国君主立宪社会这个大环境来看，封建礼教，包办婚姻，传统思想，伦理道德，等级观念，门当户对和女性在婚姻中没有或缺乏自主权利等现象，是造成小说中所反映的曹七巧和吉拉蒂在爱情和婚姻上悲剧的多种因素。这些社会因素是笼罩在曹七巧和吉拉蒂头上的一个不可摆脱的精神枷锁，也是她们在爱情婚姻上产生悲情意识的土壤和社会环境。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曹七巧在嫁到姜家之前就认识了姜家三少爷姜季泽。然而，曹七巧对爱情的追求和希望享有美好婚姻的愿望，却被扼杀在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之下。曹七巧出身低微，家境贫寒，靠买麻油过活。即使姜家三少爷有意，想必姜家也是不会让三少爷与曹七巧自由结合的。何况姜家三少爷也已经结了婚。

包办婚姻，门当对户的封建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是很普遍的。如果不是姜家二少爷得了“骨痲”不能下床走动成了一个“残人”，早就娶了有钱人家的小姐了。姜家二少爷的这种身体状况，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是不会嫁给他的。姜家没办法只好通过媒人找到曹家，让曹七巧嫁过去给他们家的二少爷当太太。曹家穷，把曹七巧嫁出去曹家多少可以得到点儿彩礼钱。

另外，曹七巧当时正恋着姜家的三少爷，尽管她嫁的不是自己爱的人，但贫寒家的女子被嫁到大户人家，起码在物质生活上有保障，好赖身份上也是大户人家二少爷的太太，而且曹七巧嫁过去还能见到她心爱的人，也能在这种不幸的婚姻中追求有幸的一点爱情。实际上，曹七巧嫁过去后成了姜家二少爷的终身看护，仆人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姜家被人看不起和说三道四。显然，在曹七巧的婚姻中既没有爱情的幸福，也没有婚姻的美满。在曹七巧眼里她是守着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在过婚姻生活，就好像在和“死人”过活一样。曹七巧只能在非正常人的婚姻中去想象正常人的婚姻，过着一种扭曲的婚姻生活，而且还要遭到别人的冷眼冷语。

然而，曹七巧所苦苦暗恋的姜家三少爷又是怎样对待她的呢？在张爱玲的笔下，姜家三少爷好逸恶劳，沾花惹草，对曹七巧也是有点意思。可他不像巴金小说《家》所描写的高家三少爷觉慧那样，虽然也是生在有钱的大户人家，可对当时的封建礼教具有叛逆和反抗的思想意识。姜家三少爷只不过是一个无所事事，好逸恶劳的败家子。而巴金笔下的高家三少爷觉慧由于接受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仅具有正义感，同情下层人物，而且勇于反对封建束缚。另外在婚姻问题上，他也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出身贫寒的丫头鸣凤相爱，同时积极支持他的二哥觉民抗拒包办婚姻。

同是封建大家庭中的三少爷，同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生活，同是面对出身低微的女子而产生的恋情，但由于生活道路的不同和所生活的环境不同等多种因素，张爱玲笔下的姜家三少爷对爱恋他的曹七巧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即使对曹七巧有心，在封建礼教下的他也没有敢于接受曹七巧恋情的胆。因为在他的头脑里，这种“不正常”的恋情，在哪个时代的封建大家庭里是大逆不道的。就算是曹七巧能豁出去，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他可承受不起这方面的闲言碎语。所以，当曹七巧被嫁到姜家后，三少爷姜季泽总是躲着曹七巧，宁可在外面与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也不敢与曹七巧有什么瓜葛。

另一方面，这个姜家三少爷是否真心爱恋着曹七巧也很难说。姜季泽总是借口躲着曹七巧，可分家后当曹七巧有了一点家产，地位和钱财后，姜季泽又主动找上门来与曹七巧套近乎，其目的就是想从曹七巧那里捞点钱。本来曹七巧还以为她与姜季泽的恋情可以死灰复燃，重续旧情，可当看出姜季泽来找她是为了**她手里的钱**，而不是为了**她心里的情**，这让曹七巧的悲情意识一下子达到了顶点，一气之下把自己一直暗恋的人给打了出去。曹七巧挫伤的泪水犹如开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倾泻而出，泪流满面。曹七巧万万没有想到，过去她与姜季泽的这种扭曲的恋情，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如今，长期压抑在她心中与姜季泽的这种情感就这样彻底了断了，这让曹七巧十分悲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从一开始，在曹七巧的爱情和婚姻中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曹七巧的悲情意识在她一踏进姜家的大门慢慢地滋生了，直到她婚姻的消亡，爱情的彻底破灭和人生的结束。曹七巧的悲情从无到有，从淡到浓，伴随着她最后凄凉的感情生活与萎缩的生命，就像从她嘴里吐出的缕缕鸦片的烟云，在空中慢慢地随风而去。

曹七巧的悲情是在当时封建礼教，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封建传统思想，严重的贫富差别等多种因素下产生的。

- 曹七巧出身低微，家境贫寒，这是曹七巧在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上的悲情。
- 曹七巧是在包办婚姻下被嫁到姜家的，没有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这是她在恋爱婚姻上的悲情。
- 曹七巧婚后名义上是姜家二少爷的太太，实际上是给姜家二少爷当传宗接代的工具，成为照看病人的仆人，连姜家的丫环也看不起她，这种被歧视的状况是她在人格待遇上的悲情。
- 曹七巧嫁到姜家后，自以为可以与她的心上人谈情说爱，在无爱的婚姻中享受一点有爱的恋情，没想到她与姜家三少爷的“偷情”，却被三少爷的无情所毁灭，这是她在情感上的悲情。
- 曹七巧在她的婚姻完结和爱情了结后，她要用不幸的婚姻所换来的家产和钱财来多少补偿她所失去的情感和青春。但再多的金钱也还回她美好的年华。人老珠黄，青春不在，这是她在人生上的悲情。
- 曹七巧在姜家不甘被歧视被欺负的生活，但她又无力对抗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家庭的欺压。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在反抗着。这就是她那不饶人的嘴，不愿被人欺的性格，但最后她还是被人给算计和欺负了，成了封建势力下一个牺牲品。曹七巧把她用自己青春年华，扭曲的婚姻，失落的爱情所换来的金钱当成她最后的人生保证，谁要算计她的钱，她就跟谁拼老命。如果说曹七巧的前半生是在追求爱情的话，那么她的后半生就是要锁住她的金钱。这是她在思想意识上从情“锁”婚到金“锁”情的转变。实际上曹七巧何尝不想一生锁住情，与自己相爱的人终成眷属。但现实生活毁灭了她的美好理想，是现实社会的无情使曹七巧后来变得无情，从而导致了她在思想认识上的悲情。
- 曹七巧由于长期过着一种扭曲的婚姻生活，看到自己儿子与儿媳过着正常的夫妻生活，有一种心理上不平衡的感觉。她通过从她儿子那里打探出其儿媳之间的夫妻生活，并把所听到的在众人面前笑谈，以满足她的变态心理，填补她那扭曲的婚姻所享受不到的正常人的婚姻生活。她这种心理上的变态是封建礼教和痛苦的婚姻给她造成的，使她的心理受到长期的损伤。她是封建礼教下“吃人”社会的受害者，这是封建礼教给她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的悲情。

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悲情，在曹七巧人生的道路上一点点地积累起来。这些悲情在曹七巧的人生中汇成了一条悲情之河，在曹七巧的心中缓缓流淌。伴随着这些悲情，曹七巧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小说的结尾，描写了曹七巧那不堪回首的记忆和对她那美好年华的追忆。小说中描写到：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两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选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倦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1]

曹七巧一边回想过去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一边在反思自己在爱情婚姻上的所为。从曹七巧的反思中读者也可以看到她所流露出在爱情和婚姻上的悲情意识。如果当时曹七巧不是为了追求与大户人家姜家三少爷的爱情，嫁给了姜家病残的二少爷，她可能就不会在爱情和婚姻上遭到这么多的痛苦和歧视，忍受这么多年畸形无爱婚姻的折磨。如今岁月流逝，人老珠黄，人生给她留下的是无奈的悔恨和永远的悲伤。曹七巧一开始嫁到姜家是带着追求美好爱情的目的的，然而最后却是带着无限的悲情离开了人世。

对生活在泰国的吉拉蒂来说，她的悲情意识与曹七巧的不同之处是在婚前就开始产生了。如果说曹七巧在婚前多少还是带着对爱情的追求和一点“喜情”嫁到姜家的话，那么吉拉蒂嫁给上年纪的再婚男子昭坤时，可以说没有一点“喜情”，而是充满了无奈的选择和悲情。

在西巫拉帕的小说中，作者给我们描写了一个在狭小圈子里生活，具有王室身份的大家闺秀吉拉蒂的情感生活。在吉拉蒂的情感生活中有喜有悲，但悲的成分要多过喜的成分。吉拉蒂的悲情意识是逐渐产生的，在她的生命即将结束时，

^[1]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572页

她的悲情意识达到了顶点。吉拉蒂的悲情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年龄上的悲情意识

当吉拉蒂还是天真烂漫的少女时，在她感情生活中一直是幸福和快乐的。然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随着年龄一年年地大了起来，当吉拉蒂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当她看到自己两个妹妹相继出嫁后，她的感情生活就不再平静了。她认为在她这个年纪很多女孩都有了自己的心上人，或已经结婚了，而她却还在空守阁楼，既无她爱的人，也无爱她的人。

吉拉蒂在她的小妹妹结婚走了以后，曾梦想过得到爱情和欢乐。然而，又过了两年，她的大妹妹也和她所爱的男人结了婚，当时吉拉蒂已经二十九岁了。她“开始感到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幸的人”。悲情意识开始进入了吉拉蒂的感情世界。这时的吉拉蒂虽然产生了悲情，但她“仍然自恃美丽而相信具有一定的魅力，还希望能够为人所爱，能够嫁给自己钟情的男子”。她这时还渴望着爱情，向往着能有一个自己的家，能够和外界交往，向往着有一个小儿子，以便把她心中的爱献给他。六年过去了，吉拉蒂生活的圈子还是那么狭小，白马王子并没有来敲她的门，得到爱情始终是吉拉蒂的一个梦。吉拉蒂的悲情意识日益加深。吉拉蒂自我表白地说：

生下来直到二十九岁都没有得到过爱情，已经是够不幸的了，但我的不幸却没有完结。我的梦想未能变成现实，一年又一年，希望越来越渺茫，直到过了三十五岁，昭坤·阿堤甘巴迪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让我抉择。^[1]

年龄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既是青春和年华的尺度，又是衰老和魅力的刻度。特别对正在追求爱情和希望结婚的大龄女性来说，一旦过了三十岁就有一种不寒而栗，开始告别青春的感觉。越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是缺乏自信心和缺乏面对年轻男士追求的勇气，而不得不把选择结婚对象的目光，转移到中老年男士的身上。这种选择让一些大龄女士有一种失落、无奈和被动的感觉。另外，这也是为什么在姐弟恋中，往往主动的是男性，而年纪大的女性常常处于守势的一个原因。为了寻找爱情，大龄女性在年龄上会有一种自卑意识和劣势感。可以说吉拉蒂的悲情意识和结婚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她越来越大的年龄给她造成的。尽管吉拉蒂有天生丽质的美貌，但无情的岁月会把任何美貌吞噬在一天天衰老的人生中。

^[1] 西巫拉帕：《画中情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50页

看到自己的女儿一直嫁不出去，连吉拉蒂的父亲也很焦虑。他认为像自己女儿“这么漂亮的女人过独居生活，做老处女，心灵深处的痛苦肯定是难以忍受的”。他爸爸对吉拉蒂说：“你和昭坤这样年纪的男人结婚是不合适的。爸爸也想让你找一个门当户对、年龄相当、而又可心的男人。现在你已经三十五岁了，就和爸爸介绍的这个人结婚吧！”^[1] 而当时吉拉蒂充满痛苦，她在心里说：

一想到自己的年纪，我的心又一次凉了。当我明确感到昭坤的求婚意味着我的希望已经破灭，意味着我已经不可能得到爱情和自己钟爱的男人结婚，意味着我的美好时光已结束的生活，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了下来。^[2]

从小说的描写中，读者不难看出在吉拉蒂的悲情意识中，年龄上的悲情是在吉拉蒂悲情意识里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造成吉拉蒂年龄上产生悲情的原因既有社会、家庭和传统文化等因素，也有吉拉蒂个人的性格、思想意识和生活环境等因素。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吉拉蒂自身的因素是造成她在年龄上产生悲情的更主要的因素。同样的社会，同样的家庭，同样的传统文化因素，为什么她的两个妹妹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爱情，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婚，而吉拉蒂却年复一年，到了三十五岁还是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爱情，更不要说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婚了。

最后，吉拉蒂终于在她父亲的劝说下，向“年龄”屈服了。如果吉拉蒂坚持没有爱情就不结婚的话，根据小说所描写的吉拉蒂的生活轨迹，她也许终身也找不到自己的爱情。命运往往是折磨人的。如果与自己不爱的人结婚是吉拉蒂人生悲剧的开始，那么正是这个悲剧给她带来了一段“喜剧”——她遇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而这个爱情又成了吉拉蒂人生道路上的另一个悲情的前奏曲，导致了吉拉蒂婚后悲情的延续。

二、婚后的悲情意识

与昭坤结婚后，吉拉蒂在昭坤的提议下到日本东京度蜜月。这让吉拉蒂终于走出了自己一直生活的狭窄圈子，来到了异国他乡。她随她的丈夫在日本度假、会友、游览、接触了广阔的世界和大自然。接待他们的是年轻英俊的诺帕朋，他当时才二十二岁，是在日本留学的泰国学生。他的爸爸与昭坤是朋友，所以他应昭坤的要求帮昭坤夫妇安排了这次来东京的住宿和游览事宜。

当诺帕朋首次见到吉拉蒂时，就被吉拉蒂的年轻美貌所吸引，对吉拉蒂产生

^[1] 西巫拉帕：《画中情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51页

^[2] 同上

了好奇和深刻的印象。他与吉拉蒂在一起“由衷地感到荣幸和自豪”。而在与诺帕朋的一段接触后，吉拉蒂“尽管表面上还是那么温柔、文静，但谁也不难看出她的内心的欣喜和总是挂在脸上的淡淡红晕”。对吉拉蒂来说当时被迫结婚是悲情，而婚后意外得到的爱情是幸福。但没有结果的爱情，不能结合的现实，相见已晚的无奈，由于年龄上的差距，有夫之妇的身份，传统思想的束缚，让吉拉蒂违心地被迫拒绝诺帕朋的爱情。就这样，吉拉蒂的情感从悲到喜，又由喜转悲，使享受爱情的幸福变成了承受爱情的痛苦，从而导致了吉拉蒂婚后的悲情意识。

以前，吉拉蒂由于没有爱情而感到悲。但在有了爱情后，却不能与有情人终成眷属，她还感到悲。如果没有来日本，如果没有碰到诺帕朋，如果没有他们之间的两情相悦，吉拉蒂在结婚时的悲情意识可能就慢慢地淡化在无所事事，没有情趣与平淡无味的夫妻生活之中了。

然而对吉拉蒂来说，在婚后，她能遇到她梦寐以求的爱情，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她需要这个爱情，但她却不能“消化”这个爱情。她被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所束缚。诺帕朋越主动，她越拘束。诺帕朋越是向她大胆表示对她的爱，她越是要把她对诺帕朋的爱说成是姐弟间的一种“友情”。年龄上的差距和已婚的身份，既是在吉拉蒂表面上拒绝诺帕朋的爱的借口，也是确实阻碍吉拉蒂毫无顾忌地接受诺帕朋的爱的一个障碍，是套在吉拉蒂的身上所不能摆脱的一个网。

吉拉蒂把对诺帕朋的爱深深地埋在心里。迟来的爱情不仅不能为吉拉蒂带来幸福，反而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哀和伤感。吉拉蒂婚后的悲情意识在有了她的爱情后进一步加深了。

三、守寡后的悲情意识

吉拉蒂带着她与诺帕朋的爱情回到了泰国。没想到她与昭坤的婚姻，因他的病逝而不幸地结束了，她又成了“自由人”。她在等待，她把对诺帕朋的爱埋在了心里。吉拉蒂多么想与诺帕朋见面，发展他们的爱情。由于吉拉蒂照顾患肺结核的丈夫，她后来也染上了这个病。她开始还遵照医生的医嘱坚持吃药，病情得到了控制。她要活下去，因为她心中还有爱，还有她爱的人。

如果说除了年龄的因素外，吉拉蒂的已婚身份是吉拉蒂与诺帕朋结合的一大障碍的话，那么这个障碍这时已经不存在了。吉拉蒂在身份上可以说是自由的了。仅就吉拉蒂的自由身份来说，她与诺帕朋的结合也许还是有可能性的。然而，当她得知诺帕朋要与别的女人结婚的消息后，她的感情再次受到了打击，她拒绝吃药，使她的病情恶化，从而更加加重了她的悲情意识。诺帕朋的结婚无疑是对吉拉蒂身心

上的一个致命打击。这使吉拉蒂认为没有了爱情的力量，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诺帕朋在见到吉拉蒂后对她产生了爱情。这既是诺帕朋的初恋，也是吉拉蒂的初恋。然而由于吉拉蒂已婚的身份和传统意识，虽然她的爱情之火在心里越烧越旺，但她极力把这种“姐弟恋”变成只是一种“姐弟情”，不让诺帕朋的爱情之火把她给融化了，一发不可收拾。吉拉蒂万万没有想到，她为了压抑自己的爱情之火而不让男友的爱情之火在燃烧，最终也埋葬了自己的爱情。诺帕朋的爱情之火最终被吉拉蒂的婉拒给彻底浇灭了。这也让诺帕朋放弃了为爱情而结婚的想法。

诺帕朋的结婚，意味着她与诺帕朋结合的可能性彻底破灭了，也意味着在诺帕朋的心中已经没有对她的爱情了。她与诺帕朋之间的爱已经不是互相的了，而只是她单方面的了，成了一种单相思。而让诺帕朋被迫放弃对吉拉蒂的爱，却是吉拉蒂自己对诺帕朋爱的“拒绝”和回避。这让诺帕朋心灰意冷，最后放弃了对吉拉蒂的追求，也使诺帕朋对生活中的爱情感到了失望和痛苦。在其父母的包办婚姻下，他最后也不得不与没有爱情女子结婚了。吉拉蒂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对诺帕朋的所作所为导致了诺帕朋的悲情意识。

本来吉拉蒂的生活一直处在一种“爱情荒”的境地。但她无爱的婚姻却让她无意中遇到了爱情。而她却在有爱的时候而“拒”爱，导致了男友被迫放弃了对她的爱，使吉拉蒂又失去了爱。爱情得而复失，最后留给她的只是她自己对男友的爱。这种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比她心中没有爱，更让她感到痛不欲生，断了她再活下去的意念。吉拉蒂的悲情意识发展到了殉情的地步。

最能反映吉拉蒂悲情意识的是小说中最后的一段描写。当吉拉蒂把她从日本回来以后亲手画的一幅画，送给诺帕朋当作他的结婚礼物时，她无限惆怅地对诺帕朋说：“你的爱情在那里萌发，也在那里消逝；但另一个人的爱情却在行将崩溃的躯体内熊熊燃烧”。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吉拉蒂的悲情意识。吉拉蒂告诉诺帕朋，这幅画里有她的生命，也有她的心。吉拉蒂送给诺帕朋这幅画就是把她的心和她的情送给了诺帕朋。

吉拉蒂在临终前道出了在这部小说里最经典，也最能反映吉拉蒂最后的悲剧意识的话语。小说的结尾是这样描写的，吉拉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有话要对诺帕朋说。她要了纸和笔，艰难地在纸上写道：

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
但我感到满足，因为有了我爱的人。^[1]

^[1] 西巫拉帕：《画中情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00页

从吉拉蒂这句临终遗言中，我们看到吉拉蒂是带着她对诺帕朋深深的爱而离去的。而且这个爱是那么地来之不易，又是那么地挥之不去，割不断，理还乱。这时在吉拉蒂的心中，能有一个爱就已经是她一生中的最大的心愿了。至于有没有被别人爱，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对吉拉蒂来说，人虽死但爱心不死。吉拉蒂含情而去，是人生的悲。没有爱她的人，是外在的悲。但有了她所爱的人，就是她内在的喜，是悲中之喜。诺帕朋是吉拉蒂人生第一个爱，也是她最后一个爱。她把这个爱当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她就是死，也要把这个爱带走，与她永远相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吉拉蒂失去了爱她的人，但她还是感到了满足。悲中遇到情，情从悲中来，情又随悲去，这就是吉拉蒂悲情意识的可悲之处。小说在吉拉蒂的悲情中结束，悲情却在吉拉蒂的灵魂中缠绕。这也就是《画中情思》这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魅力。

通过以上对曹七巧和吉拉蒂的悲情意识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一、在共性方面

曹七巧和吉拉蒂悲情意识的共性主要表现在，她们都因为失去了自己所爱的男人而感到痛苦。她们的悲情反映在她们所失去的爱情上。她们爱着她们的情人，希望与她们的情人结合，可到头来，她们都不能与她们所爱的人终成眷属。在她们的心里都有一种痛苦的失落感和无尽的伤感。

曹七巧是为了她所爱的姜家三少爷而违心地嫁给了病瘫在床的二少爷。然而，曹七巧所做出的牺牲并没有让她得到三少爷的爱，反而让她失去了爱，失去了美好的年华，到头来是人老珠黄，后悔莫及。她为了保住她用青春和心血的代价换来的金钱，一气之下，把她一直恋着的三少爷给打跑了。她不能用自己的情锁住别人的爱，而只能用她的青春换来的“金”来抵偿她失去的情。

而吉拉蒂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不得不把自己嫁给了五十多岁的男人。虽然她是无爱而婚，但却因婚而得到了婚外的爱，与在日本的泰国留学生诺帕朋有了婚外情。不幸的是吉拉蒂既渴望这个爱，又没有勇气大胆接受这个爱，反而在表面上拒绝了爱他的男友被迫放弃了对她的追求，使她失去了爱她的人，而她只能心里保留着她所爱的人。她想要用心来锁情，然而却把情人“锁”在了她的心外。

另一方面，不管是曹七巧还是吉拉蒂，她们都是和她们不爱的男人结了婚，都是恋着婚外的男人。这种婚姻状况和情感世界的矛盾，必然在她们们的现实生活中产生冲突。这种矛盾的激化在她们的情感世界中最终难以平衡，因而导致悲情意识的产生和不断加深。

二、在个性方面

虽然曹七巧和吉拉蒂都是因爱情而产生了悲情。但在具体表现上却反映出她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社会背景，伦理道德，思想意识，性格特质和处世为人的方式。

曹七巧的悲情意识所涉及的内容要比吉拉蒂的广泛。在曹七巧的悲情意识中不仅有爱情方面的悲情，还包括身份的低微、家境贫寒，被人看不起和受歧视。曹七巧是带着这些种种悲情周旋在姜家大户，最后又带着孤独和伤感之情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说吉拉蒂在离开人世前能感到满足，是因为她还有她爱的人，那么曹七巧却是既没有爱她的人，也没有她所爱的人，成为了孤家寡人。她是带着无奈和悔恨，凄凉和孤独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对吉拉蒂来说，她的悲情意识主要是集中在情感方面。她出身王室之家，有一定的地位。她的生活远比一般的泰国民众要好很多。在泰国她是被人仰视的，有身份的人。再加上她长得漂亮，在生活上没有人会歧视她，反而由于她的美貌和气质常得到别人的赞美。所以在社会层面，吉拉蒂没有曹七巧的那些悲情意识。她的悲情大部分是反映在个人感情方面，具体表现在对男友诺帕朋的感情上。她爱她，却不能拥有他。她想他，却在表面上拒绝他。世俗观念和传统思想束缚了吉拉蒂的情感，让吉拉蒂只能把这种情感强行压在心里，让自己备受爱情的煎熬。其结果，她只能在不可自拔的感情世界中挣扎，最后被这种情感的漩涡所吞噬。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似乎曹七巧嫁到姜家是为了金钱，即曹七巧在爱情毁灭后死死抓住金钱不放。实际上在金钱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被金“锁”住的“情”。从情感上来说，曹七巧最终是死在无人所爱的孤独中，而吉拉蒂是死在只有爱他人而无被他人所爱的的伤感中。然而，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她们的悲情意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当时她们所生活的封建社会，传统礼教和伦理道德，以及个人的品性所造成的。

从表现手法上来看，张爱玲在这部作品里，一开始就给小说定下了一个悲情的基调。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就是“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与小说的开头相呼应，在小说中的结尾再一次提到月亮。只是这时“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1]这种完不了的悲情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和无尽的回味。

张爱玲虽然用自己的文才写完了这部优秀的作品，但在她走出小说后，却似

^[1]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572页

乎又再用她自己真实的故事和人生经历在继续着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文学中的这部作品反映的是悲情，在现实中张爱玲的生活所反映的也是悲情。从作品中的“完不了”到现实生活中的“完不了”，张爱玲给后人对其作品的深入研究和比较分析也似乎是“完不了”。

而在《画中情思》这部作品中，西巫拉帕也是用一种前后呼应的描写手法把女主人公的悲情意识给融合在小说中。与张爱玲以月亮为描写对象，作为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不同的是，西巫拉帕的这部小说是从对一幅画的回忆开始，到最后揭示这幅画的由来和归属而结束。小说通过这幅画贯穿了一系列的悲情描写。这幅画的作者吉拉蒂，虽然含着无限的悲情离开了人间，没有了爱她的人，但她在悲情中又有自己的满足，这就是因为她有了她爱的人。

曹七巧在不堪回首的往事回忆中带着悲情走了。吉拉蒂把记录她的爱情的画送给男友后，也带着对爱情的执著在伤感中走了。不管是《金锁记》还是《画中情思》都是以悲情作为小说的基调，以悲剧作为小说的结尾。这两部小说正是通过这两个女性的心路历程，把这种悲情用生动的描写和细腻刻画给展现了出来。

结 语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是两部反映女性文学的佳作。一部出自中国女性作家张爱玲之手，一部是出自泰国男性作家西巫拉帕之笔。在他们的小说中各自反映了中国和泰国三四十年代不同特点的悲情女性形象，一个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个是《画中情思》中的吉拉蒂。

由于张爱玲和西巫拉帕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特色和各自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不同的创作背景，创作视角和文化语境**。本文从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他们不同的创作视角。

一是小说整体描写上的不同视角：

- 张爱玲借景叙事的创作视角
- 西巫拉帕借人叙事的创作视角

二是小说在具体叙述上的不同视角：

- 张爱玲由近而远的叙述视角
- 西巫拉帕由远而近的叙述视角

张爱玲由近而远的叙述视角和西巫拉帕由远而近的叙述视角，分别是与其借景叙述和借人叙事的整体创作视角相辅相成，相互协调的。

另外，张爱玲的《金锁记》与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的写作特点，描写手法和思想内涵都与他们写作的时代和所身处的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这种文化语境包括两个方面：

一 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语境

一 上海文化与曼谷文化的语境

如果说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是思想意识层次上的语境，那么在张爱玲和西巫拉帕的身上和作品中，分别所反映出的上海文化和曼谷文化的语境，就是表现在地域层次方面了。像张爱玲所具有的上文化语境那样，西巫拉帕在其文学创作中也有自己的曼谷文化语境。

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曼谷文化与上海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西巫拉帕的曼谷

都市文化的语境涉及的面，要比张爱玲的上海文化的语境更广泛和深入。

纵观西巫拉帕的一系列的作品，既有平民形象，也有贵族形象；既涉及婚姻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问题，又涉及到知识分子的觉醒和人民对不平等社会的反抗和斗争；既有反对封建帝制的社会变革，又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气概。这些在张爱玲的作品语境中似乎是看不到的。两者在文化语境上的不同也反映出他们在思想意识上的落差。

张爱玲和西巫拉帕在创作上具有一些共同点和也有各自的特点。他们的文学创作反映出他们不同的文学视角，文化色彩，思想意识，人生态度和民族特点。

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是中国文化，上海特色和市民话语的一个代表和展示的话，那么西巫拉帕的小说创作就是泰国文化，曼谷特色，大众话语的代表和体现。

此外，本文对两个不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与吉拉蒂的**身世，处世和知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从表面上看，是在描写一个似乎爱财如命，见利忘义，六亲不认的女人。实际上，在她锁金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曹七巧的悲情和无奈。她在用金锁情，用到手的金来代替失去的情。金与情在曹七巧那里实际上已融为一体。从《金锁记》中我们看到了曹七巧从情“锁”婚到金“锁”情的悲剧一生。

与曹七巧不同，出身王室的吉拉蒂嫁给了有钱有地位、丧妻不久的五十岁的男人。她在无爱的婚姻中遇到了真爱，有了婚外情，但她因为自己的年龄、已婚的身份和传统思想的束缚，却在表面上拒绝了这个真爱。最后她在不断压抑和涌起的爱情漩涡中把自己埋葬了。吉拉蒂从无爱到有爱，从无情有情，从而走完了从情“锁”爱到爱“锁”心的悲情一生。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分别向读者展示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她们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爱情意识**
- **婚姻意识**
- **悲情意识**

从张爱玲这部小说的整个故事来看，曹七巧的爱情意识可以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 **一是婚前对爱情的渴望、强烈的追求和自我牺牲。**

二是婚后爱情发展的曲折、晦涩和无奈。

三是分家后爱情意识转化为金钱意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在曹七巧的头脑里爱情意识的发展变化是随着其本身的生活发展轨迹而表现出来的。与曹七巧不同，吉拉蒂的爱情意识表现在另外的三个方面：

一是吉拉蒂认识诺帕朋前的爱情意识。

二是吉拉蒂与诺帕朋相识后的爱情意识。

三是吉拉蒂离开诺帕朋和丧夫后的爱情意识。

在吉拉蒂的身上反映出了爱情意识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然而，尽管在吉拉蒂的爱情意识中存在着矛盾和复杂的心理因素，但她对爱情的渴望却并没有因为不能得到爱而熄灭和绝望，反而爱情之火在她的心里越烧越旺。

曹七巧和吉拉蒂的婚姻意识都是以她们的爱情意识为基础的，是爱情意识在婚姻上的反映。在分析曹七巧和吉拉蒂的婚姻时，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婚姻意识中的“三态”：正态——变态——病态**。如果说曹七巧的婚姻意识是从**正态的**婚姻意识转变成**变态的**婚姻意识的话，那么吉拉蒂的婚姻意识却是从**正态的**婚姻意识转变成**病态的**婚姻意识。不管是变态的婚姻意识还是病态的婚姻意识，她们都不能在婚后真正享受到爱情的幸福和婚姻的美满，反而带给她们的却是：

无奈的现实，

痛苦的等待，

被迫的放弃，

和永远的遗憾。

对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和西巫拉帕笔下的吉拉蒂来说，她们都是生活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是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个是深受泰国佛教思想的影响。不管是出身低微还是出身高贵，她们在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中都有着一种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是她们生活上的悲情，家庭上的悲情，爱情上的悲情和婚姻上的悲情在其人生中的一个集中反映。

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和泰国君主立宪社会这个大环境来看，封建礼教，包办婚姻，传统思想，伦理道德，等级观念，门当户对和女性在婚姻中没有或缺乏自主权利等现象，是造成小说中所反映的曹七巧和吉拉蒂在爱情和婚姻上悲剧的多种因素。这些因素是笼罩在曹七巧和吉拉蒂头上的一个不可摆脱的精神枷锁，也是她们在爱情婚姻上产生悲情意识的土壤和社会环境。

通过对曹七巧和吉拉蒂的悲情意识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性。

在共性方面：

- 她们都因为失去了男方的爱而感到痛苦。
- 她们的悲情主要反映在她们所失去的爱情上。
- 她们都爱着她们的爱人，可都不能与她们所爱的人终成眷属。
- 在她们的心里都有一种痛苦的失落感和无尽的伤感。

在特性方面：

- 曹七巧的悲情意识所涉及的内容要比吉拉蒂的广泛。
- 吉拉蒂的悲情意识主要是集中在情感方面。
- 她们的悲情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社会背景，伦理道德，思想意识、性格特质和处世为人。

通过本论文对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金锁记》和对泰国现代男作家西巫拉帕《画中情思》这两部文学作品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作家和其创作的作品在社会制度，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和传统思想上有着种种区别，但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反映共同的题材和主题，所不同的是在其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因作家的创作视角，描写手法，生活阅历和思想意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在作品中表现出各自的情节，文学特点，生活气息，文化背景，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

本文通过对《金锁记》和《画中情思》的比较分析，以揭示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的背景下，在封建礼教、传统思想和旧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和影响下，所造成作品中两个不同女性的不同遭遇，分析产生悲剧性结局的多种原因，探讨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意识，并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对比中泰现当代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和创作风格。